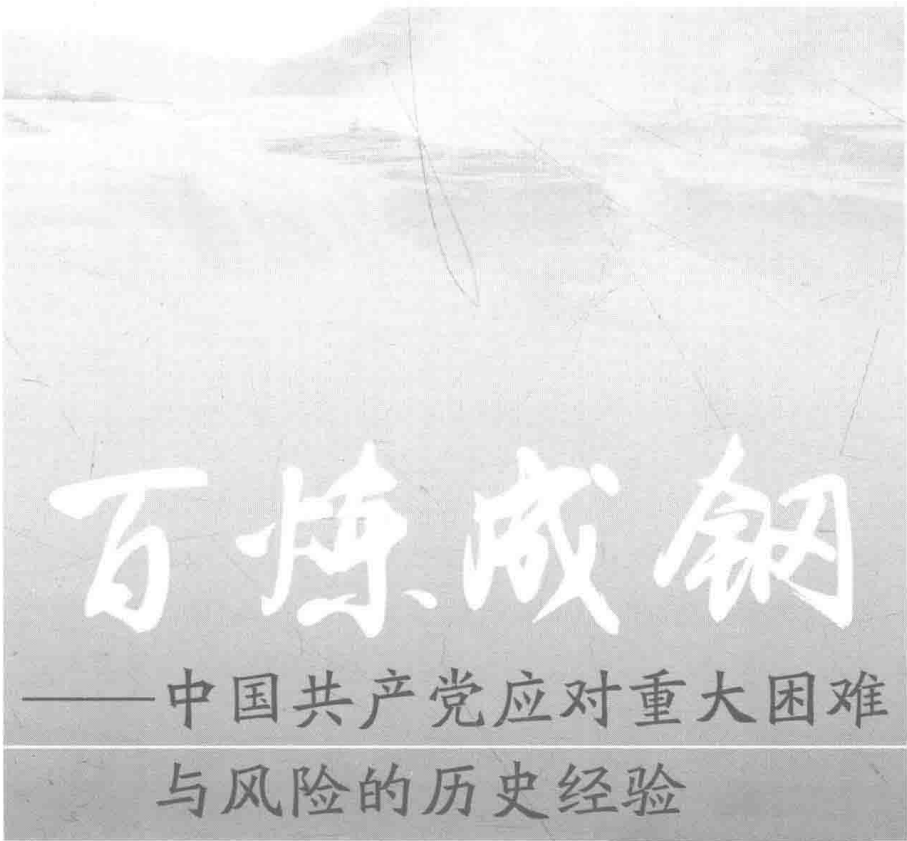


百炼成钢

——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困难
与风险的历史经验

柳建辉 等◎著

 人民出版社



百炼成钢

——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困难
与风险的历史经验

柳建辉 等◎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世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炼成钢: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困难与风险的历史经验/柳建辉等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01-017265-1

I. ①百… II. ①柳…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史 IV. ①D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10837号

百炼成钢

BAILIAN CHENG GANG

——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困难与风险的历史经验

柳建辉 等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26

字数:410千字

ISBN 978-7-01-017265-1 定价:68.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引 言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既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实现国家和社会历史巨变、不断取得辉煌成就的历史，也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不断把革命、建设、改革、发展事业推向前进的艰难奋斗史。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多次经历关系自身前途命运甚至生死存亡的历史关节点，经受了一系列重大困难与风险的严峻考验，鲜明凸显了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所具有的治党、治国、治军和理政能力。这是一笔非常宝贵的历史财富，值得认真总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的那样：“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是最好的营养剂”。尤其是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艰难险阻，系统回顾党经历的重大困难与风险，深刻总结其科学应对的经验启示，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90多年来，从白色恐怖下的殊死抗争到抵御外侮的浴血奋战，从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到与特大自然灾害的艰苦搏斗，从国内政治风波的严峻考验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饱受冲击，中国共产党在经历和应对各种困难与风险的斗争中发展壮大，日益成熟。从这些困难与风险的影响程度来看，它们有的是全局性的，有的是局部性的。其中大多可称为危局或困局，如党在大革命失败后面临的严峻危机和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的困境，以及“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困局等。此外，有些虽然尚未达到生死存亡的严重程度，但亦堪称复杂局面，如党在抗战胜利后和建国初期面临的空前挑战，以及1956年的国际共运危机和国内社会异动，两次金融危机和几次特大自然灾害等带来的冲击等。而无论是危局、困局还是复杂局面，都给党的事业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与风险，使它不断地面对挑战、迎接挑战，从

而战胜挑战，化险为夷。

从这些困难与风险的持续时间来看，它们既有长期性的，又有短期性的。长期性的如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陷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全局性的“左”倾错误，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严重挫折。短期性的则如世纪之交接连发生的特大自然灾害和重大疫情，其持续时间虽然不长，但同样给国民生产和社会生活带来了暂时性的困难。而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的困难与风险，显然都不易应对。应对失误，会影响全局，或是带来长远的消极影响。

从这些困难与风险的形成原因来看，它们也有不同的类型。有的是由自然界直接造成的，如洪灾和罕见地震等特大自然灾害。有的则是因为时代背景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抗战胜利后和建国初期面临的严峻挑战。有的主要是外源型的，如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引起的国内社会异动，以及1997年和2008年先后爆发的两次金融危机。有的则主要是内生型的，即自身失误所导致，如“大跃进”运动和“文革”造成的困局等。此外，还有一些困难与风险是在内外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如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其中既有敌强我弱的原因，也有中国共产党自身决策的失误等。

总之，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应对的一系列重大困难与风险，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因素，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其复杂程度和应对处理难度均世所罕见。但中国共产党最后都有效地应对了这些复杂局面，不断把革命、建设、改革、发展事业推向前进。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迄今所走过的历程绝非一帆风顺和波澜不惊，很多时候它恰恰是在险象环生中披荆斩棘、艰难前行的，是在不断应对挑战、克服困难、战胜风险、破解危局中走过来的。在这一过程中，常有危难之际的绝处逢生、挫折之后的毅然奋起、磨难面前的百折不挠，以及失误之后的拨乱反正；既充满艰险又富于神奇，既历尽苦难又辉煌迭出。最终，党愈挫愈奋、百炼成钢，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不断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赢得历史和人民的郑重选择。这既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历史特点，又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成功、创造辉煌的奥秘所在！

本书中，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重点探讨了中国共产党成功应对的以下十次

重大困难与风险：

（一）成功应对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的危局，开创了土地革命蓬勃兴起的新局面。党从创立后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到与国民党合作进行北伐战争，再到国民党大规模反共、“清共”，其间不到 6 年时间。在这短短的 6 年时间内，中国共产党由最初的 50 多人，发展成为一个拥有近 6 万名党员、领导着 280 余万工人和 970 余万农民的具有相当群众基础的革命政党。1927 年反革命势力掀起的血雨腥风和白色恐怖，使党和人民的力量遭到惨重损失，党的许多优秀干部，群众运动的领袖，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党外革命人士倒在血泊中，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根据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的不完全统计，从 1927 年 3 月到 1928 年上半年，被杀害的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达 31 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 2.6 万多人。当时有人写文章称，这个时期，“中国要算是全世界最悲惨的白色恐怖的国家了”^①。在极其险恶的局势下，党内思想一时异常混乱，不知道何去何从，一些不坚定分子纷纷脱党甚至叛党，有的还领着敌人搜捕共产党人。据 1927 年 11 月统计，党员数量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近 6 万人急剧减少到 1 万多人。原来蓬勃发展的各地工会和农民协会也到处被查禁或解散，党领导的工会会员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 280 余万人减至几万人，中国革命陷入了低潮。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遇到的第一次重大挫折，全党正面临着被反革命势力瓦解和消灭的危险。

但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没有在始料不及的困境面前退缩，而是在绝境中奋起，开始了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艰难历程。1927 年 8 月 1 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随后的中共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为党从失败走向胜利指出了新出路。其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创建、发展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突破了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的束缚，逐步找到了一条推动中国革命走向复兴和胜利的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这条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

^① 超麟：《惨无人道之中国白色恐怖》，《布尔塞维克》第 1 卷第 3 期，1927 年 11 月 7 日，第 69 页。

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折。

（二）成功应对1934年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困境，实现革命的历史转折，推动了抗日战争的兴起。随着农村根据地的创建、发展与巩固，中国革命力量逐渐壮大。这不能不引起反革命势力的恐慌，于是大规模的“围剿”疯狂而至。从1930年冬至1931年秋，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成功地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围剿”。1932年底至1933年初，周恩来、朱德又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指挥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但由于敌人力量异常强大，且改变了战略战术，加上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苏区的统治，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红军主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战略转移初期，红军损失惨重，仅1934年11月的湘江战役，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就减员半数以上。中央苏区沦陷，其他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也都受到了极大损失。中国革命向何处发展，革命的有生力量如何才能得到最大程度地保存，成为全党面临的严峻考验。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了中共中央的组织和军事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使红军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转危为安。此后，红军又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一路风餐露宿，爬雪山过草地，抛头颅洒热血，击退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并粉碎了张国焘企图分裂中央的阴谋，最终完成了这一在世界军事史上可谓空前绝后的战略大转移，保留和锤炼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向成功的最坚强的骨干队伍。长征胜利结束后，能否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国内的阶级关系，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又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党中央在准确把握中日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与国民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达成停战协定，促成西北大联合局面的形成，并通过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推动国共两党达成第二次合作，由此掀起了全民族抗战的高潮。

（三）成功对抗战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的复杂时局，迅速夺取全国

政权。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十分复杂的政治局面。在国内，一方面，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拥有120多万党员的大党，抗日根据地的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发展到220万人，自身力量和革命实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壮大。但在抗战中付出了巨大牺牲的中国人民迫切要求重建和平的生活，坚决反对内战，强烈希望国共两党携起手来，用和平的方法建立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另一方面，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却自恃有一支500多万人的所谓“装备精良”的军队，且拥有丰富的物质基础，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试图垄断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在中国继续维持反动统治。在国际上，美国政府大力援助国民党，反对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但也不赞成中国马上发生内战。苏联则过高估计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力量，过低估计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多次向美国和国民党的代表表示，中共没有能力领导统一中国，他们只承认并支持国民党政府这个“唯一合法政府”，希望中国能在蒋介石处于“领袖地位”的前提下实现统一。他们甚至致电中共中央，说中国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①。

在这种和平希望与内战危险并存的复杂时局下，面临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抉择，中共中央对“二战”和抗战胜利后的基本形势进行了深刻分析，认为以美国支持下的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避免战争的可能性很小，但在和平还有一线希望的时候仍要争取。为此，党中央一方面命令各根据地和部队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巩固已有阵地，做好战斗准备，“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②；另一方面也顺从民意，真诚地提出了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口号。毛泽东还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前往重庆，同蒋介石就国共两党关系的重大问题进行谈判，赢得了全国各政治力量和人民的同情支持。然而，虽然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尽了最大努力，但国民党政府最终还是悍然发动了内战。对此，中国共产党坚决果断地领导进行了三年多

①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4页。

的解放战争，科学决策、出奇制胜、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进行了规模空前的战略决战，消灭了国民党几百万军队，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了除台湾等岛屿外的全国领土，摧枯拉朽般地迅速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四）成功应对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执政的新考验，在建设新国家、新社会、新制度等方面取得伟大胜利。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军事上，国民党残余力量犹在负隅顽抗，妄图卷土重来。经济上，国民党留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由于长期战乱的影响，国民经济已破败不堪，生产萎缩，交通梗阻，民生困苦，失业众多。1949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仅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2/3。特别是由于国民党政府长期滥发纸币，造成了物价飞涨、投机猖獗、市场混乱的局面。中国共产党是否有能力制止恶性通货膨胀，把经济形势稳定下来，把生产恢复起来，这在当时是比进军和剿匪都更加困难的严峻考验。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华实行政治上孤立、军事上威胁、经济上封锁的政策，并竭力阻挠其他国家承认新中国，阻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一切对刚从农村走进城市、执掌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都是崭新的难题，要求他们在全新的任务面前，以最短的时间学会全新的本领。

对建国之初的国内外复杂局势，中共中央早已未雨绸缪，并领导全党满怀信心地迎接挑战。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告诫全党夺取全国政权后面临的困难和风险会更加复杂艰巨，全党同志务必保持清醒的头脑，把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应对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建国后，党领导人民迅速肃清匪乱，医治战争创伤，平抑物价、统一财经，荡涤了鸦片烟毒等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安定了社会秩序，并继续推进完成了全国土地改革，使3亿多无地和少地农民获得了土地，大大激发了其生产积极性。到1952年底，国民经济即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在工农业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国家财政收入不但达到平衡，而且略有盈余，不仅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和物价的稳定，而且开始了对重点建设的投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更为明显，1952年全国各地区职工的平均工资比1949年增加60%—120%，工人的工资收入一般已达到或超过抗日战争前的水平，整个国家呈现了前所未有的蒸

蒸蒸日上的生机和活力。以此为基础，党又采取符合中国特点的步骤和措施创造性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当时，曾经有人预言：“共产党的军队于1949年进军战胜国民党时，他们结束了几十年的战争，不过他们的斗争刚刚开始。中国领导人在恢复中国经济并使之现代化方面遇到巨大的困难”，由此“中共的胜利将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短短几年便用事实击碎了这个“预言”。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仅能领导人民打碎一个旧世界，而且也有能力领导人民建设一个新中国。

（五）成功应对1956年国际共运危机和国内社会异动，缓解和控制社会矛盾，理顺了社会关系。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秘密报告，尖锐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触及了当时苏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一些已经难以回避的矛盾。这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引起极大的震动，在群众中造成不同程度的思想混乱，社会上弥漫着动荡不安的气氛。一些西方国家乘机掀起世界性的反共浪潮，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巨大困难。从当年6月开始，波兰和匈牙利先后发生了罢工、游行示威和骚乱。受此影响，同年秋，中国国内也开始出现了一些不安定的情况。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完成，加上经济建设中出现冒进的影响未能完全消除，一些新的社会矛盾突出出来。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半年时间内，全国发生数十起罢工、请愿事件，每起事件少则数十人，多则一二百人甚至近千人。在农村，1956年夏收以后，不少地方连续发生闹缺粮、闹退社的风潮。而对国内外形势最为敏感的知识分子，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思想也日趋活跃，纷纷批评教条主义，有些人对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以及干部作风上的问题提出批评，其中有不少尖锐意见。面对这些新出现的矛盾，许多党员和干部思想上缺乏准备，往往用老眼光，把群众闹事和尖锐批评一概视为阶级斗争的表现，企图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进行压制，这无疑更激化了矛盾。

① [美] 唐耐德著，朱立人等译：《艰难的抉择：美国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争论（1949—1950）》，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3、47页。

面对国内外这种复杂的局势，中共中央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首先是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1956年4月和12月，中共中央先后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表明自己的原则立场。同时也指出，揭开斯大林的盖子，对于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包括我们党，破除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迷信，解放被教条主义绳索束缚的思想，努力寻求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有重要的意义。其次，中共中央还积极参与波匈事件的解决，缓和了国际共运危机，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针对国内社会异动也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如毛泽东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这一根本思想。实践中，中央也在分配、消费、就业和改善知识分子待遇等方面作了不少努力，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异动。1957年2月，毛泽东又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从理论上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新学说，解释了国内出现的闹事现象，并将之大部分归结为人民内部矛盾，随即又在全党发起了一场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这表明，当时党试图以波匈事件为鉴戒，从整顿党的作风入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以缓解党和人民群众关系间的某些紧张状态。但随着整风鸣放的深入开展，又出现了一些复杂的情况。5月中旬，毛泽东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标志着运动的主题开始转向对敌斗争，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由此造成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

（六）成功应对1958—1960年“大跃进”运动造成的困局，采取措施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全国各族人民迸发出空前的建设热情，显示了新制度的强大生命力。但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1958年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此后，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在全党“反右倾”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了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

遭到重大损失。许多地方城乡居民因食物营养不足出现了浮肿病，人口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提高，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

面对这种困难的局势，1961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把1961年搞成实事求是之年、调查研究之年。通过迅速制定和执行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如大力精减职工，减少城镇人口；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停建缓建大批基本建设项目；缩短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进一步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支援农业；加强财政管理，稳定市场，回笼货币，抑制通货膨胀等，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在这一系列强有力举措的作用下，1962年到1966年的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七）成功应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局面，坚定实施工作重点转移，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由于党和毛泽东把阶级斗争看得过于严重，对国际特别是对国内出现修正主义的现实危险性看得过于严重，进而导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想不断积累和发展，最终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1966年至1976年的10年“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在思想上、政治上混淆敌我，“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无限上纲，乱批乱斗，制造大批冤假错案，以致国无宁日，家无宁日。在经济上，以大搞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取代正常的经济建设，大批“唯生产力论”，严重摧毁了社会生产秩序，人们生产热情低落，经济效益普遍大幅度下降，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进一步拉大了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在思想文化和教育领域，全盘否定建国17年来思想文化和教育工作的成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名存实亡，文艺创作凋零，科学技术研究受挫，教育遭受重创，广大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在党的建设上，“踢开党委闹革命”，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党的各级干部被当成“走资派”打倒，受到迫害；绝大多数党组织甚至一度停止了组织生活；一批造反派进入党内，造成党组织的严重不纯，党的指导思想被搞乱，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优良作风和纪律被败坏。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文革”虽已结束，拨乱反正工作也已开始，但由于长期“左”倾错误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

易在短期内消除，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在一段时间内仍然延续，党和国家的工作出现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干部群众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通过1978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从根本上纠正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强调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从而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以此为开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历史新时期，党和国家充满活力地踏上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八）成功应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外三大突发事变的冲击，引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航船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出现动荡。西方敌对势力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通过多种渠道对我国施加影响。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下，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进程受到严重干扰。1989年春夏之交，国内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从北京迅速波及到全国各大中城市。在这个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党中央紧紧依靠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采取果断措施，一举平息动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经受住了政治风波的重大考验。

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后，美国带头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对中国实施所谓的“制裁”。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都跟着美国参与了对中国的“制裁”。这给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国家建设带来了巨大困难，使中国遇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强大的外部压力。如何打破西方发达国家的无理“制裁”，既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又使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破坏的双边关系得到恢复和改善，继续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确实是对中国政府驾驭复杂局势、处理对外关系能力的考验。面对西方国家这种来势凶猛的“制裁”，中国政府坚持原则，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出发，提出

并实行“坚持原则，利用矛盾，广交朋友，多做工作，打破制裁，避免孤立”的方针政策，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通过艰难的努力，坚决抵制和逐步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制裁”。

接踵而来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到空前挫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纷纷下台，政权更迭，制度更替。其程度之激烈、速度之急遽，不但出乎中国人民的意料，也出乎整个西方集团的意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弹冠相庆，预言苏东剧变的“多米诺骨牌”的下一个目标将是中国，因而纷纷利用这一时机，加大对中国实行“西化”、“分化”、“弱化”的力度，妄图以其强大的经济、科技、军事实力做后盾，利用其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手段，达到对社会主义“不战而胜”的目的。如何顶住西方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压力，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又是一个重大的考验。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党中央沉着应对，在“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战略策略指导下，成功挫败了国际反华势力企图扭转中国社会主义方向的图谋，稳住了改革发展的大局，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特别是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精辟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深刻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回答了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在谈话中，他重申必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强调党的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全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从此，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带领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成功地推向了21世纪。

（九）成功应对新形势下两次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造成的困境，保持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1997年7月以后，以泰铢大幅贬值为肇端，东南亚一些国家和韩国相继发生金融危机，日本也出现金融动荡，而且来势迅猛，波及面广，世界经济受到严重影响。由于国际市场萎缩等因素，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呈现下降趋势，经济建设遇到严重困难。面对这一冲击，党中央当即提出“坚定信心，心中有数，未雨绸缪，沉着应付，埋头苦干，趋利避害”的指导方

针，果断采取扩大国内需求的措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决定由中央财政向商业银行增发长期建设国债，增加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改善人民生活；并采取出口退税、打击走私等措施，千方百计增加出口，从多方面拉动经济增长。这些对策很快见效。1997年后，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相应改善，外贸出口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大幅度回升，国家外汇储备增加。在周边许多国家因这场危机出现经济衰退、货币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中国实现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为缓解这场影响全球的金融风暴承担了风险，付出了代价，作出了积极贡献，树立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赢得了亚洲和全球舆论的广泛赞誉。

2008年9月，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愈演愈烈，迅速从局部蔓延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又酿成了一场历史罕见、冲击力极强、波及范围很广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至今余波未绝，仍是国际关注热点。在这场危机中，中国受到的冲击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更大，经济运行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外贸出口急剧回落，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社会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在这场来势凶猛的全球金融危机面前，党和政府迅速出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10项措施，及时制定并完善了一系列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政策，形成了系统、完整的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一揽子”计划。与此同时，我国还积极参与国际峰会，共商应对危机之道，呼吁世界各国加强政策协调，密切合作，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这一全球性挑战。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不懈努力，随着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效果逐渐显现，我国经济运行开始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经济增长下滑的趋势得到明显遏制，在全球率先实现了经济形势总体回升向好，并在2009年取代德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2010年又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十）成功应对世纪之交的特大自然灾害和重大疫情，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1998年入汛后，我国遇到一场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长江、嫩江、松花江发生超历史纪录的特大洪水，珠江流域的西江和福建闽江也一度发生大洪水，受灾人口达2.23亿，给灾区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对国民经济发展造成直接影响。面对特大洪水的袭击，党中央和国务院审时度势，正确

判断，周密部署。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亲临抗洪第一线，各级领导干部纷纷奔赴现场，同广大军民一道顽强奋战。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 30 余万官兵参加抗洪斗争，涌现出了一批英模人物，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全国上下一致，军民协同作战，形成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忍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最终夺取抗洪抢险斗争的全面胜利。

2003 年，正当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而奋斗的时候，我国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病灾害，广东、北京的疫情尤为严峻，引起了举国上下的普遍担忧，也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面对这场人类从未遇到过的、严重危及人民生命的考验，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果断决策，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研究部署疫情的防控工作，并要求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认真负责、靠前指挥，本着沉着应对、措施果断、依靠科学、有效防治、加强合作、完善机制的总体要求，切实做好“非典”的防治工作。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紧急应对，“非典”疫情在较短时间内就得到了有效控制，并最终取得了抗击“非典”的重大胜利。这场胜利使党和全国人民极大地提高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能力，积累了应对突发事件的重要经验，进一步增强了对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城市和农村协调发展的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从而使防治“非典”这场斗争成为我们改进工作、加强社会建设和公共卫生建设、更好地推进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

2008 年 5 月 12 日，四川汶川发生了建国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震级达里氏 8 级，最大烈度达 11 度，使人民生命财产和经济社会发展遭受了巨大损失。面对重大自然灾害，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顽强拼搏，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抗灾救灾工作，谱写了中国共产党应对困难的新篇章。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党和政府迅即组织起中国历史上救援速度最快、动员范围最广、投入力量最大的抗震救灾行动，最大限度地挽救了受灾群众的生命，最大限度地减低了灾害造成的损失。在救援过程中，一共从废墟中抢救出 84017 名群众，解救被困群众 149 万名，430 多万名伤病员得到及时救治，1510 万名紧急转移安置的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安排，881 万名灾区的困难群众得到救助。在救灾的同时，党和政府还着手研究部署灾后重建工作，决定按照“一省帮一重灾县”的原则，建

立对口支援机制。很快，经过几年的恢复重建，灾区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满目疮痍到焕然一新，从山河破碎到整洁有序，灾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群众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明显超过了灾前水平，实现了一个大的跨越，基本实现了家家有房住、户户有就业、人人有保障、设施有提高、经济有发展、生态有改善的重建目标。这标志着灾后恢复重建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面对历史上的重大困难与风险，应对有效而成功。